

## 論文

## 杜甫之隱逸意識析論

蔡慧崑\*

## 摘要

深受儒家思想薰陶的杜甫，終究未能實現其致君行道、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卻也無法全然跳脫對政治的想望，在任真自得的心境下出世隱逸。杜甫的性格其實嚮往自然、不喜應接人事，卻又不得不勉強自己努力求仕，矛盾顯而易見。隱逸之於杜甫，好像巨石之於希臘神話裡的西西弗斯(Sisyphus)，在積極用世的意志擺布之下，隱逸成為杜甫永無止盡卻又徒勞無功的追尋。不過，杜甫仰慕真隱，不將隱逸當作仕進的手段或附和「朝隱」、「吏隱」之風，能夠在幽居生活中學習自我寬解並反省人生，使其隱逸意識之內涵逐漸深化為具體而理性的生命思維，亦有可觀者焉。

**關鍵詞：**杜甫、隱逸、意識、盛唐

## 一、前言

杜甫生於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卒於唐代宗大曆五年(770)，是盛唐極為重要的詩人。翻檢杜詩，可知杜甫平生雖以儒者自任、用世之心堅執深切，但其隱逸出世之意緒、念頭在不同時期的詩作中卻也有不一而足的表述。

杜甫不止一次地嚮往隱逸、思考隱逸，然而他並未真正隱逸，就這樣，詩人醞釀出一種進退矛盾的生命情調。對隱逸之嚮往或隱逸意緒、念頭的表述，雖未臻於哲理性、系統化的「思想」(Philosophical Thinking)層次，卻有可觀者焉，不失為詩人生命「意識」(Awakening)之呈現，不啻為杜甫對人生境遇的體認和覺察，更能反映杜甫看待隱逸的態度與行為傾向。仔細玩味，實有助於我們認識杜甫其人的不同面貌。

有鑑於此，本文即以杜甫之隱逸意識為研究重心，首先探討杜甫的家世背景、政治抉擇、佛道因緣對其隱逸意識之影響，進而分析隱逸意識在杜詩中呈現的情形，以釐清詩人之隱逸意識因何萌生、有何發展及詩人進退矛盾之所以然。最後，將杜甫與同時期的盛唐詩人之隱逸意識作形態上的比較，由其間的異同來理解杜甫隱逸意識的特殊性。

---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 二、杜甫的家世背景、政治抉擇、佛道因緣對其隱逸意識之影響

杜甫嚮往隱逸、思考隱逸，卻沒有真正隱逸。究其因由，可知杜甫的家世背景、政治抉擇、佛道因緣對其隱逸意識有一定程度之影響，或消解，或引動，或深化，今分論如下。

### (一)家世背景

杜甫的十二世祖杜恕任曹魏幽州刺史；杜恕之子杜預為西晉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曾為《左傳》作注。自晉至唐，杜氏家族不乏仕宦敦儒之人，然官階與家道卻逐漸式微。杜甫〈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一文強調自己的家世：

遠自周室，迄於聖代，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sup>1</sup>

又於〈進鵬賦表〉中提及：

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勳不復炤耀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sup>2</sup>

先祖杜恕、杜預以來「奉儒守官」的家族傳統固然令杜甫感到自豪，但面臨門第衰落的困境，如何加以改善，對身為杜氏子孫的詩人而言卻是責無旁貸的挑戰，如何傳承「奉儒守官」的家風，持續藉由仕宦以實踐履儒家之道，自然被杜甫視為極其重要的人生目標。

在儒學家風的薰陶之下長大，杜甫對自己的儒者身份有著深刻的體認和執著，從而養成忠君憂民的堅定信念。他「竊比稷與契」，且「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sup>3</sup>一心一意想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sup>4</sup>、「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sup>5</sup>；他期望和杜預一樣建功立業於當世，終生不敢忘本，即使到了晚年漂泊荊湘，仍然「涼憶峴山巔」，猶思「吾家碑不昧」，<sup>6</sup>念念不忘先祖的勳業；又曾以「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sup>7</sup>之語期許兒子宗武。在在顯示杜甫亟思有所作為，俾使家道得以提振，儒術得以傳承，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自己能夠實現致君行道、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如此一來，參加科舉以求

<sup>1</sup> 見〔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卷25（按：杜文集注），頁2229。

<sup>2</sup> 見《杜詩詳注》，卷24，頁2172。

<sup>3</sup> 句皆出自〈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見《杜詩詳注》，卷4，頁264-265。

<sup>4</sup> 句出〈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見《杜詩詳注》，卷1，頁74。

<sup>5</sup> 句出〈鳳凰臺〉。見《杜詩詳注》，卷8，頁692。

<sup>6</sup> 句皆出〈迴棹〉。見《杜詩詳注》，卷23，頁2086。

<sup>7</sup> 句出〈又示宗武〉。見《杜詩詳注》，卷21，頁1850。

仕進成為杜甫必經的道路，在重視詩賦的科舉制度下，杜甫表現出「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sup>8</sup>的自負，他對詩歌創作的興趣與信心，受到祖父杜審言的鼓舞和啟發，<sup>9</sup>這從他「吾祖詩冠古」<sup>10</sup>、「詩是吾家事」<sup>11</sup>等豪語中可見一斑。總之，兼善天下的儒家理想以及詩歌創作的文學成就乃杜氏家族的榮耀所在，亦構成杜甫生命中價值實踐的基調。<sup>12</sup>

不可諱言，杜甫「奉儒守官」的家世背景，與他的隱逸意識之形成、發展是相衝突的，甚至對其隱逸意識造成某種程度的消解或壓抑。雖然杜甫自負家學，但平生仕宦之追求並不順遂，事君行道、經世濟民的理想終告落空，又遭逢唐代由盛而衰的亂離，失意困頓的際遇確實曾令杜甫數度萌生隱逸的想法或情緒。然而，由於杜甫始終秉持「奉儒守官」的使命，懷抱忠君憂民的信念，使他的隱逸意識往往未能真切而堅定地落實，換言之，他沒能真正成為一個身心都能完全超然出世的隱士。安史之亂前後，杜甫憂國憂民的情懷在其詩作中顯而易見，儘管他曾有過隱退的思考。方其棄官華州，有意歸隱秦州、同谷之時，抑或詩人屏跡成都草堂之際，仍為中原亂事與吐蕃入寇而憂心；當他在夔州東屯瀼西間居的同時，不忘為百姓面臨時危賦重而牽掛。由此可知，杜甫深受儒學傳承的家世背景影響、終究無法專心致力於隱逸的事實與矛盾。

## (二)政治抉擇

杜甫隱逸意識之醞釀與萌發，亦隨著他的政治抉擇而呈現順逆互見的情形。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杜甫初應科舉考試落第後，轉往齊趙漫遊，內心仍期待仕進的機會。天寶六年(747)，杜甫應詔長安，遭李林甫之忌而落選，這是他第二次的科場挫敗。應詔失利對杜甫的隱逸意識固然不無啟發，卻並不深刻。從杜甫在應詔失利後的幾年中一再以詩文向達官貴人干求薦引、接連獻賦於玄宗而望其憐才擢用的行為看來，杜甫仍舊選擇向仕途邁進，只是採取了不同於科舉的途徑來實現理想罷了。應詔失利後所產生的隱退之想，

<sup>8</sup> 句出〈壯游〉。見《杜詩詳注》，卷16，頁1441。

<sup>9</sup> 《舊唐書·文苑傳》調杜審言：「雅善五言詩，工書翰，有能名。」見《舊唐書》，卷190上，頁4999。

<sup>10</sup> 句出〈贈蜀僧閻丘師兄〉。見《杜詩詳注》，卷9，頁767。

<sup>11</sup> 句出〈宗武生日〉。《杜詩詳注》，卷17，頁1477。

<sup>12</sup> 歐麗娟指出：「第十三代祖杜預以儒家經世術業之功績形塑了理想的化身，確立了向外在世界建立的普世兼善的群體事業；而祖父杜審言則以詩歌創作之成就啟動了文學的繆思，開展了向內在心靈認取的個人獨特的藝術境界，兩者一文一武地共同建構了完整的價值實踐。」見歐麗娟：《唐代詩歌與性別研究--以杜甫為中心》(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頁55。

是一時的失意情緒使然，發發牢騷、聊以自遣的成份居多。天寶十四年(755)安史之亂前夕，杜甫聊取微祿，出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的閒職，後來因不肯受趨炎附勢的官場習氣拘束，亦萌生倦勤歸隱的念頭。

安史之亂期間，杜甫擔任左拾遺之職，值唐肅宗乾元元年(758)，面對房琯罷相的事件，他選擇犯顏直諫，如《新唐書·文藝傳上》杜甫本傳載：

(甫)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鎰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然帝自是不甚省錄。<sup>13</sup>

挺身諫諍，使杜甫失去了唐肅宗的信任，這般際遇與當時杜詩流露為官不如意、及時行樂等無奈、疏散意緒互為因果。尤有甚者，房琯出貶邠州後，杜甫亦因先前的諫諍而被視為房琯同黨，遭貶為華州司功參軍，令杜甫對仕途的前景更加灰心，歸隱的心思油然而滋長，最終以華州饑饉為由而棄官。棄官決定的內在，其實隱含著杜甫對仕途的失望(但並非絕望)。後來他在秦州、同谷短暫居留，隱逸意識逐漸深化，曾有意要卜居歸隱。

乾元二年(759)底入蜀後，杜甫定居成都草堂，享受他人生中難得的田園幽居生活。然而，杜甫深知隱逸生活是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來支持的，棄官後缺乏經濟支援的生活窘境，迫使他不得不為衣食溫飽而另謀出路，秦州、同谷歸隱的作罷實與經濟條件的缺乏有關。杜甫在蜀中亦多半依賴杜濟、高適等親戚朋友的援助，才得以維持幽居屏跡的生活。唐代宗廣德二年(764)，杜甫好友嚴武再次鎮蜀，舉薦杜甫為檢校工部員外郎，邀他任赴幕府參謀，詩人就職後並不喜歡如同「吏隱」、「朝隱」的幕府生活，加上幕府裡人事複雜、阿附成風，自己又遭同僚疑忌，<sup>14</sup>讓杜甫為官頗不順心，不到一年即辭官而去。杜甫於大曆元年(766)夏天移家夔州，其後在夔州都督柏茂琳的支助下，過了近兩年較富足的閒居生活。這時期的杜甫除了慨嘆老病，也常有「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sup>15</sup>、「長懷報明主，臥病復高秋」<sup>16</sup>等思君戀闕之語，晚年仍時時表露為朝廷效力的心意。即便是他漂泊荆湘時，還曾多次託人向朝廷進言，希望朝廷能起用他這位老臣，足見詩人對政治的熱情並沒有因為自

<sup>13</sup> 見《新唐書》，卷 201，頁 5737。

<sup>14</sup> 杜甫〈莫相疑行〉詩中云：「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即寫此境遇。見《杜詩詳注》，卷 14，頁 1214。

<sup>15</sup> 句出〈同元使君春陵行〉，見《杜詩詳注》，卷 19，頁 1693。

<sup>16</sup> 句出〈搖落〉，見《杜詩詳注》，卷 19，頁 1726。

己仕途失意或年老多病而減卻。也因為對政治理想的執著，使杜甫即便棄官、辭官，甚至在思緒或生活逐漸向隱逸靠近的同時，仍然沒有放棄仕進的追求，當仕或當隱，箇中矛盾不言而喻。

### (三)佛道因緣

此外，佛道因緣對杜甫的隱逸意識內涵的增益亦值得注意。天寶三年(744)杜甫與熱衷於訪道求仙的李白一見如故。其後杜甫同李白「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瑤草」<sup>17</sup>，曾到王屋山拜訪道士華蓋君，因華蓋君已然去世而不得見。天寶四年(745)杜甫與李白重逢於魯郡，又同上東蒙山，訪道於董鍊師及元逸人。長安應詔失利的前幾年，杜甫受李白影響而對訪道求仙相當投入，學道的經歷、感想，後來也伴隨著他的隱逸意識在詩作中反映出來，甚至內化成為詩人隱逸意識的重要成份之一。杜甫遊覽過不少寺院，對佛學亦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又結交過許多僧人朋友，其中以旻上人與贊公尤為著名。開元十九年(731)，杜甫南遊吳越，曾與旻上人賦詩對弈，結下深厚的友誼，這是杜甫佛教因緣的發端。安史之亂杜甫陷居長安期間，得與長安大雲寺住持贊公交游，其後兩人同因房館之累而遭貶逐，杜甫由華州棄官至秦州時再逢贊公，來往十分密切，甚至相約卜居歸隱，杜甫對佛教義理也有進一步地涉獵。到了晚年，杜甫對仕進失望的情緒與日俱增，詩中時而流露歸依佛門的念頭，正與詩人隱逸意識的發展互相呼應，而杜甫對佛理的領略，也同他學道一樣，充實了隱逸意識的內涵。

### 三、杜甫之隱逸意識在其詩作中的呈現

杜甫之隱逸意識在他一生不同時期的詩作中均有所呈現，今分期(科舉受挫；應詔失利；干謁、獻賦未獲回響；初官長安；任左拾遺至華州棄官；流寓秦州、同谷；幽居成都草堂；夔府閒居；荊湘漂泊)論述如下。

#### (一)科舉受挫

開元二十三年(735)杜甫初應科舉受挫後，赴齊趙等地漫遊，其〈夜宴左氏莊〉詩云：

林風織月落，衣露靜琴張。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檢書燒燭短。  
看劍引杯長。詩罷吟吳詠，扁舟意不忘。<sup>18</sup>

對自負才學的杜甫而言，「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sup>19</sup>的挫折，難免讓他產

<sup>17</sup> 句出〈贈李白〉，見《杜詩詳注》，卷1，頁33-34。

<sup>18</sup> 見《杜詩詳注》，卷1，頁22。

<sup>19</sup> 句出〈壯游〉，見《杜詩詳注》，卷16，頁1441。

生一些消極的情緒，是以在寄興閒遊之時，乘坐扁舟、歸隱江湖的念頭油然而生。不過，平心而論，科舉失利並沒有對詩人造成多大的打擊，「扁舟意不忘」之語亦多屬消極情緒的宣洩，一時的苦悶很快就被漫遊的快意所取代。

其後，杜甫初次〈贈李白〉詩云：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腥羶，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  
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  
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sup>20</sup>

齊趙歸來後兩年的洛陽客居生活裡，杜甫看到世俗的豪官富賈們如何投機取巧、勾心鬥角，內心十分厭惡。他嚮往和李白一樣訪道求仙，追尋超脫世俗的生活。不久，詩人果然和李白一同尋訪董鍊師、元丹丘(逸人)等道士，杜甫的這般舉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隱逸。

然而，杜甫訪道求仙的行動並未持之以恆，他再次〈贈李白〉詩寫道：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  
雄？<sup>21</sup>

「未就丹砂愧葛洪」之語把繼續求道的李白比作葛洪，亦道出杜甫並未消極避世、潛心修道，他選擇回到長安，全心投入在仕宦的追求。<sup>22</sup>

## (二)應詔失利

長安應詔失利後，杜甫有〈贈比部蕭郎中十兄〉一詩說：

見知真自幼，謀拙愧諸昆。漂蕩雲天闊，沉埋日月奔。致君時已晚，  
懷古意空存。中散山陽鍛，愚公野谷村。寧紆長者轍，歸老任乾坤。<sup>23</sup>

杜甫感慨自己懷才不遇，不如學嵇康、愚公隱逸山野、歸老舊鄉。這類的隱逸意緒，在詩人長安應詔失利後的一段時日裡是常有的，他寫給韋濟的詩裡亦提及：

濁酒尋陶令，丹砂訪葛洪。江湖漂短褐，霜雪滿飛蓬。牢落乾坤大，  
周流道術空。謬慚知薊子，真怯笑揚雄。〈奉寄河南韋尹丈人〉<sup>24</sup>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  
詩看子建親。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

<sup>20</sup> 見《杜詩詳注》，卷1，頁33。

<sup>21</sup> 見《杜詩詳注》，卷1，頁42。

<sup>22</sup> 劉長東即指出：「雖然杜甫並無將求仙隱逸作為『終南捷徑』的意思，但他的求仙隱逸中卻沒有多少消極避世的成份，而應該視之為他開元十九年以來吳越齊趙漫遊活動的繼續。」見劉長東：〈論杜甫的隱逸思想〉，《杜甫研究學刊》1994年第3期，頁20。

<sup>23</sup> 見《杜詩詳注》，卷1，頁67。

<sup>24</sup> 見《杜詩詳注》，卷1，頁69。

淪。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入秦。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sup>25</sup>

由「濁酒尋陶令，丹砂訪葛洪」、「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入秦」之語，顯見杜甫的隱逸之思，彷彿他真的要隱退了。不過，仔細觀察杜詩的其他內容，以及杜甫在應詔失利後干謁公卿的作為，就會瞭解這時期杜甫的隱逸意識既不深刻也不踏實，大抵是科場受挫後衍生的不滿情緒使然，意在抒發內心的牢騷而已。杜甫寫詩給韋濟，不是為了要強調隱逸的志向，其詩亦陳述自己有優秀的才學、遠大的理想以及科舉失利後的生活困頓。「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之語，正如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云：「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踈踈。……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sup>26</sup>又〈贈韋左丞丈濟〉說：「老驥思千里，饑鷹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sup>27</sup>反復強調其追求仕進的壯心未已，以至想歸隱卻不免遲疑，出處之間充滿矛盾，希望韋濟能惜才而汲引的用意相當清楚。杜甫以儒者自居，用世之心深切，其隱逸之思在這些干謁詩中所佔的地位遠不及對仕進的企盼，<sup>28</sup>充其量只不過是對自己的身世遭際所發的不平之鳴罷了。<sup>29</sup>

### (三)干謁、獻賦未獲回響

往後數年，杜甫以詩文向長安達官貴人多方干謁，並屢次向唐玄宗進賦，努力追求仕進，當他干謁、獻賦沒有獲得回響、徒勞無功之際，詩作中亦流露隱逸意識。杜詩云：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曲江二首章五句〉其三<sup>30</sup>

儒術誠難起，家聲庶已存。故山多藥物，勝概憶桃源。欲整還鄉旆，長懷禁掖垣。〈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sup>31</sup>

<sup>25</sup> 見《杜詩詳注》，卷1，頁77。

<sup>26</sup> 見《杜詩詳注》，卷1，頁77。

<sup>27</sup> 見《杜詩詳注》，卷1，頁73。

<sup>28</sup> 孫永忠即指出，隱逸並非杜甫此時主要的生命志趣。參見孫永忠：〈愛花欲死杜陵狂--談隱逸為杜甫開啟新生命情趣〉，《輔仁國文學報》第27期(2008年10月)，頁80。

<sup>29</sup> 誠如簡明勇所言：「只是對自己遭遇的坎坷，前途黯淡、營生無計下，發出百無聊賴的一種浩嘆而已。」見簡明勇：《杜甫詩研究》(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年)，頁1-177。

<sup>30</sup> 見《杜詩詳注》，卷2，頁139。

<sup>31</sup> 見《杜詩詳注》，卷2，頁132。

詩中的隱逸意識顯然因其仕進不順遂所引發。即便杜甫的努力無效，宦途似乎不可為，而讓他萌生隱退之意，但是他依舊惦念著「儒術」、「家聲」，亦即「奉儒守官」家族傳統，足證詩人仍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欲去還留的猶豫、進退兩難的矛盾昭然若揭。

我們不能忽略杜甫對隱逸的嚮往，但必須強調的是，隱逸若要化為具體行動，除了詩人內心主觀意願的真實想望之外，外在客觀環境的穩定的經濟支持亦不可或缺，如杜甫〈重過何氏五首〉詩其五寫道：

到此應常宿，相留可判年。蹉跎暮容色，悵望好林泉。何日霑微祿，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sup>32</sup>

又其遊漢陂時作〈漢陂西南臺〉詩云：

知歸俗所忌，取適事莫並。身退豈待官，老來苦便靜。況資菱芡足，庶結茅茨迥。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景。<sup>33</sup>

為什麼杜甫只能「悵望好林泉」，感覺「斯遊恐不遂」呢？除了他的政治理想尚未實現、還無法安心歸隱之外；「何日霑微祿，歸山買薄田」、「況資菱芡足，庶結茅茨迥」數句，更透露詩人清楚知道：隱居生活需有穩定的經濟基礎，要以生計自給、衣食無虞為前提。當時的杜甫還沒有為官霑祿，謀生都成問題，即便他懷抱棲身物外的念頭，也只能對悵望林泉，扁舟之願未能付諸實現。

#### (四)初官長安

天寶十四年(755)安史之亂前夕，杜甫終於獲得朝廷授官，出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其〈官定後戲贈〉：

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颺。<sup>34</sup>

長久以來干謁無成的杜甫終於得官入仕，「狂歌託聖朝」之句顯見他的喜悅，此間詩人隱退的思緒都暫時拋諸腦後了。

杜甫在為官霑祿後不久，卻有過倦勤歸隱的想法，如其〈去矣行〉一詩寫道：

君不見韝上鷹，一飽即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野人曠蕩無覓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sup>35</sup>

正直的性格使然，杜甫不願意在官場王侯之間趨炎附勢，讓他萌發餐玉藍田

<sup>32</sup> 見《杜詩詳注》，卷3，頁171。

<sup>33</sup> 見《杜詩詳注》，卷3，頁184。

<sup>34</sup> 見《杜詩詳注》，卷3，頁244。

<sup>35</sup> 見《杜詩詳注》，卷3，頁245。



的遁世意圖。無奈的是，詩人仍舊未能如願隱居。其〈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詩云：

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遣，放歌破愁絕。<sup>36</sup>

在官小職閒的情況下，杜甫在宦途上有志難伸，遑論要達成其致君堯舜、兼善天下的理想，可杜甫卻又不忍放棄仕進的機會。杜詩表明自己恥於干謁，和他不願趨炎附勢是性格是互相呼應的；但為了實現致君行道的政治理想，杜甫還是向達官貴人干謁了。要言之，詩人不乏對隱逸江湖的嚮往，卻因為他執著於政治理想的追尋，以致無法投身隱逸之列。縱使靦顏干謁、屈己仕宦，有愧對巢父、許由等隱逸高士的自覺，詩人仍不忘強調自己實有隱逸江海的意願，由此，不難發現杜甫身與心、出和處之間時而存在的牴觸。

安史之亂爆發後，杜甫陷居長安時作〈大雲寺贊公房四首〉詩其四中也提到：「艱難世事迫，隱遁佳期後。」<sup>37</sup>又有〈獨酌成詩〉詩說：「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sup>38</sup>面對政局的動亂與世事的艱難，杜甫憂心忡忡，只好將隱逸意識的落實延後了。

### (五)任左拾遺至華州棄官

後來杜甫擔任左拾遺之職，因為直諫房琯罷相的事觸怒唐肅宗而遭疏遠、不受重用。杜甫原想藉由仕進來實現致君堯舜的理想，如今雖然如願為官，卻又因君上「不甚省錄」而疏遠，依舊無法一展抱負，宦途失意卻不忍隱退的他，只好遊曲江，以「每日江頭盡醉歸」、「懶朝真與世相違」、「細推物理須行樂」、「傳語風光共流轉」<sup>39</sup>等疏放的行為，消極應對他的官職，藉醉酒、賞景排遣時間，及時行樂。「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未拂衣」<sup>40</sup>之語，道出杜甫此間無法有所作為、卻又被官位束縛而遁世不能的惆悵。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杜甫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不久即棄官而去的決定，正與他此前一連串消極情緒的累積有關。詩人華州棄官前有〈立秋後題〉一詩指出：「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sup>41</sup>從華

<sup>36</sup> 見《杜詩詳注》，卷4，頁265-266。

<sup>37</sup> 見《杜詩詳注》，卷4，頁337。

<sup>38</sup> 見《杜詩詳注》，卷5，頁384。

<sup>39</sup> 句出〈曲江二首〉，見《杜詩詳注》，卷6，頁446-448。

<sup>40</sup> 句出〈曲江對酒〉，見《杜詩詳注》，卷6，頁449。

<sup>41</sup> 見《杜詩詳注》，卷7，頁544。

州棄官到秦州時的〈貽阮隱居〉詩又說：「更議居遠村，避喧甘猛虎。足明箕穎客，榮貴如糞土。」<sup>42</sup>即清楚揭示自己辭官歸隱的意緒。

### (六)流寓秦州、同谷

秦州時期，杜甫已無官職，其隱逸意識有所發展。他藉〈遣興五首〉詠贊嵇康、龐德公、陶潛、賀知章、孟浩然等古今隱逸者，<sup>43</sup>表露自己意欲歸隱山林的情懷，間亦抒發棄官的無奈。其〈遣興三首〉詩其三云：「時來展才力，先後無醜好。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芝草。」<sup>44</sup>則感慨自己賢士晚遇，當如鹿皮翁之求仙遯世矣。更進一步，杜甫還有卜居東柯谷、西枝村等地的計畫，如其詩云：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客舍雨連山。阮籍行多興，龐公隱不還。東柯遂疏懶，休鑷鬢毛斑。〈秦州雜詩二十首〉其十五<sup>45</sup>  
東柯好崖谷，不與衆峰羣。落日邀雙鳥，晴天卷片雲。野人矜絕險，水竹會平分。採藥吾將老，兒童未遣聞。〈秦州雜詩二十首〉其十六<sup>46</sup>  
一昨陪錫杖，卜鄰南山幽。年侵腰腳衰，未便陰崖秋。重岡北面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兼土，斯焉心所求。近聞西枝西，有谷杉柰稠。亭午頗和暖，石田又足收。……柴荆具茶茗，逕路通林丘。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寄贊上人〉<sup>47</sup>

杜甫棄官以後，的確有心想要過隱逸的生活，借阮籍、龐公之隱逸以自方，既無心出仕，鬢斑亦不須鑷矣。詩人在秦州與贊上人重逢，交遊甚歡，欲「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想和贊上人一同卜居歸隱。

從杜甫曾提及的「丹砂訪葛洪」、餐玉藍田等隱逸之念，可以發現他受早年訪道求仙影響的痕跡。又因他與贊公往來密切，由〈別贊上人〉詩裡引佛典：「楊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sup>48</sup>來寫贊公隨寓而安，亦能看出此時杜甫對佛學的理解。

然而杜甫最終並沒有隱居秦州，如其詩寫道：

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不爨井晨凍，無衣牀夜寒。囊空恐羞澀，

<sup>42</sup> 見《杜詩詳注》，卷7，頁545。

<sup>43</sup> 見《杜詩詳注》，卷7，頁562-565。

<sup>44</sup> 見《杜詩詳注》，卷7，頁548。

<sup>45</sup> 見《杜詩詳注》，卷7，頁585。

<sup>46</sup> 見《杜詩詳注》，卷7，頁585。

<sup>47</sup> 見《杜詩詳注》，卷7，頁597-598。

<sup>48</sup> 見《杜詩詳注》，卷8，頁667。

留得一錢看。〈空囊〉<sup>49</sup>

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發秦州〉<sup>50</sup>

離開秦州，固然與杜甫的性格不喜應接稠雜之人事有關，但秦州物產缺乏、謀生條件惡劣才是他無法在此駐足隱逸的主因。從生活的現實面考量，隱逸畢竟不能缺乏經濟基礎，這是杜甫早年就明白的道理。即使有古今隱逸典範作為他精神的鼓舞，有道術和僧侶作為他意念的憑藉，但衣食不能自給、生計不能自謀的窘境卻無法置之不理，因此，棄官後的杜甫未能成為遺世而獨立的隱士，還得無奈地為生活奔走、尋找出路。

到頭來杜甫沒有效法龐德公等高士隱居避世，從離開秦州後所作〈赤谷〉詩云：「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sup>51</sup>可以窺見捨棄隱逸而為稻粱謀的杜甫心中有所介意，曾在去秦或留秦、入世或出世之間掙扎過。<sup>52</sup>詩人在同谷短暫停留後作〈發同谷縣〉詩中則寫道：

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平生懶拙意，偶值棲遁跡。去住與願違，仰慚林間翮。<sup>53</sup>

生性懶拙的他喜歡偏僻的同谷，心中對自在無拘束的隱居生活著實有所嚮往，卻因「物累」所迫(妻兒或生活的重擔)、奔波勞頓而事與願違。對杜甫而言，歸隱與否所當考量的，不只有他個人，他必須顧慮到家人的生計。換言之，隱逸不是杜甫一個人的事。

### (七)幽居成都草堂

直至乾元二年(759)底入蜀，在成都草堂定居後的日子，杜甫才得以過著較為穩定的幽居生活。他入蜀後的詩寫道：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但有故人供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江村〉<sup>54</sup>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時起，

<sup>49</sup> 見《杜詩詳注》，卷8，頁620。

<sup>50</sup> 見《杜詩詳注》，卷8，頁672。

<sup>51</sup> 見《杜詩詳注》，卷8，頁676。

<sup>52</sup> 參見黃奕珍：《杜甫自秦入蜀詩歌析評》(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頁9。

<sup>53</sup> 見《杜詩詳注》，卷8，頁705。

<sup>54</sup> 見《杜詩詳注》，卷9，頁746。

漁舟個個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屏跡三首〉其二<sup>55</sup>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必林泉。遭亂到蜀江，  
臥病遣所便。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惟有會心侶，數能同釣  
船。〈寄題江外草堂〉<sup>56</sup>

杜甫居蜀前後不足六年。在親友的資助下，經濟問題獲得改善，他於成都西郊浣花溪畔構築草堂為寓居之所，其間雖曾避軍亂而奔走梓、閬二州一年餘，但多數時候生活尚能溫飽。<sup>57</sup>詩人表明自己生性愛好自然，甘心遁世屏跡，洵非虛言。方其時，他確實嚮往且逐漸習慣清靜悠閒的田園生活，詩中揭示的隱逸意識和喜悅亦不乏真情流露。<sup>58</sup>質言之，經濟有所依憑的蜀中閒居，不僅家計不虞匱乏，使杜甫的身心較無後顧之憂，生活和思慮上比從前更接近隱逸，亦使他看起來比較像是一位隱士。

除了生活悠閒清靜之樂，杜甫也與蜀中僧侶交游，學佛益發殷勤，對佛理的參詳、領悟已然成為杜甫隱逸意識的重要內涵。其詩有云：

何恨倚山木，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老夫貪佛日，  
隨意宿僧房。〈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sup>59</sup>

我住錦官城，兄居祇樹園。……漂然薄遊倦，始與道侶敦。景晏步修  
廊，而無車馬喧。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贈蜀僧闍丘師兄〉<sup>60</sup>

甫也南北人，蕪蔓少耘鋤。久遭詩酒污，何事忝簪裾。王侯與螻蟻，  
同盡隨邱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謁文公上方〉<sup>61</sup>

與闍丘、文公等僧人往來，使杜甫較從前更貼近佛門義理，「王侯與螻蟻，同盡隨邱墟」之語顯示他對生命意義有進一步的領悟。

杜甫蜀中詩作也時常提及對仙、道的嚮往：

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幸君因旅客，時寄錦官城。〈送段功曹歸廣州〉<sup>62</sup>

<sup>55</sup> 見《杜詩詳注》，卷 10，頁 882。

<sup>56</sup> 見《杜詩詳注》，卷 12，頁 1013-1014。

<sup>57</sup> 黃奕珍指出：「(杜甫)入蜀之行基本上就是對美好生活的追尋，這當中衣食飽暖應為首要的目標。」見黃奕珍：《杜甫自秦入蜀詩歌析評》，頁 57。

<sup>58</sup> 莫礪鋒認為：「杜甫雖然有強烈的用世之志，但他的本性是極端厭惡機巧而喜愛自然的，所以草堂裡的疏放、真率的生活使他感到由衷的喜悅。」見莫礪鋒：《杜甫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147。

<sup>59</sup> 見《杜詩詳注》，卷 9，頁 764。

<sup>60</sup> 見《杜詩詳注》，卷 9，頁 765。

<sup>61</sup> 見《杜詩詳注》，卷 11，頁 951。

<sup>62</sup> 見《杜詩詳注》，卷 11，頁 928。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其四<sup>63</sup>

必須指出的是，這時期杜甫對於仙、道的嚮往，與他衰老多病的身體、求藥養生的處境是息息相關的。

整體而言，閒靜的生活雖然讓老病的杜甫感到愜意，不過杜詩當中還是可以看出他在蜀中屏跡之際內心的矛盾：

風色蕭蕭暮，江頭人不行。村春雨外急，鄰火夜深明。胡羯何多難，樵漁寄此生。〈村夜〉<sup>64</sup>

花飛有底急，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可惜〉<sup>65</sup>

步履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薄劣慚真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獨酌〉<sup>66</sup>

涼氣曉蕭蕭，江雲亂眼飄。風鳶藏近渚，雨燕集深條。黃綺終辭漢，巢由不見堯。草堂樽酒在，幸得過今朝。〈朝雨〉<sup>67</sup>

雖有「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期許，但杜甫畢竟不同於陶潛，他無法真正寬心遣興、任真自得地出世隱逸。浣花溪畔樵漁詩酒所營造的閒情逸致，並沒有讓杜甫忘掉異族入寇家國的危機，也沒有完全消解詩人對其政治理想未能實現的遺憾。換言之，他喜愛草堂幽居的意趣，但他沒有陶潛「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那般曠達的情懷。<sup>68</sup>即便杜甫說他「本無軒冕意」，但是他也承認自己「薄劣慚真隱」，明白自己的隱逸與真正的隱逸實有所差距。縱使幽居真能使其怡情養性，然而杜甫還是有著「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年時」、「黃綺終辭漢，巢由不見堯」的無奈，懷才不遇、壯志未酬的感慨溢於言表。從這個角度看來，杜甫不算是一個合格的隱士，其人身雖隱而心實未隱，此時杜詩所反映的隱逸意識，雖看似高士自道且不乏真情，然嚴格說來，大抵

<sup>63</sup> 見《杜詩詳注》，卷13，頁1108。

<sup>64</sup> 見《杜詩詳注》，卷9，頁778。

<sup>65</sup> 見《杜詩詳注》，卷10，頁803。

<sup>66</sup> 見《杜詩詳注》，卷10，頁804。

<sup>67</sup> 見《杜詩詳注》，卷10，頁814。

<sup>68</sup> 陳貽焮就指出：「須知老杜雖極諳閑適之趣，奈何他並非真正的曠達之人！這是他的痛苦和悲哀。」見陳貽焮：《杜甫評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冊中，頁617。

是使用「隱逸話語」來描寫自己的寓居空間、生活情態和自我形象，著意把自己「描寫」成隱士，這和他內心真實的求仕意志之間不免存在衝突、矛盾之處。<sup>69</sup>進而言之，詩人是被動地接受閒居的生活的，如果他的仕途順遂，如果沒有戰亂，他不會流寓於成都，他蜀中間居的終極目標仍是為了待時而出仕(如果還有仕宦的機會)。杜甫可謂不得已而表現隱遁行止者，此時他對隱逸意識之鋪陳和踐履，則可視為其未能仕宦之一種自我慰藉的舉措。<sup>70</sup>

杜甫在蜀中曾短暫出仕，即應好友嚴武之薦任其幕府參謀。不過，幕府為官的際遇，畢竟與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的政治理想差距甚遠，其詩寫道：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疏雨過高城。葉心朱實看時落，階面青苔老更生。  
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sup>71</sup>

老去參戎幕，歸來散馬蹄。稻梁須就列，榛草即相迷。蓄積思江漢，疏頑惑町畦。  
暫酬知己分，還入故林棲。〈到村〉<sup>72</sup>

悲秋迴白首，倚杖背孤城。江斂洲渚出，天虛風物清。滄溟恨衰謝，朱紱負平生。  
仰羨黃昏鳥，投林羽翮輕。〈獨坐〉<sup>73</sup>

白水魚竿客，清秋鶴髮翁。胡為來幕下，祇合在舟中。……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  
周防期稍稍，太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sup>74</sup>

杜甫短暫出仕，是為了回報好友嚴武的知遇。雖然杜甫曾說自己有愧於真隱，但他也不喜歡近似「吏隱」、「朝隱」而無大作為的幕府生活。幕吏閒職，既不能實現詩人的政治理想，亦與他對隱逸應有的超然認知相違背。杜甫所仰慕的是巢父、許由、龐德公之類的真隱士，對他而言，半官半隱、在仕隱之間游離的「吏隱」生活顯然不稱意，甚至恐為浣花溪裡的花嘲笑。再者，此時的杜甫年老多病，已然習慣悠閒自在的生活模式，加上他狂簡的個性，自然不

<sup>69</sup> 參見蘇怡如：《獨立蒼茫自詠詩--杜甫入蜀以後詩歌析探》(臺北：世新大學，2013年)，頁113。

<sup>70</sup> 參見蘇怡如：《獨立蒼茫自詠詩--杜甫入蜀以後詩歌析探》，頁141。

<sup>71</sup> 見《杜詩詳注》，卷14，頁1171-1172。

<sup>72</sup> 見《杜詩詳注》，卷14，頁1174。

<sup>73</sup> 見《杜詩詳注》，卷14，頁1176。

<sup>74</sup> 見《杜詩詳注》，卷14，頁1179。

想委屈自己，不想再被幕府事務、規矩以及不甚友善的人際氛圍所束縛。因此，杜詩中一再表明「暫酬知己分，還入故林棲」、「仰羨黃昏鳥，投林羽翮輕」、「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等解職歸隱的心意，不願再受官位朱紱的羈絆。

### (八)夔府閒居

夔州時期是杜甫之隱逸意識發展的另一個重要階段，這時間詩人生活的經濟基礎也是較為穩定的。他的夔州詩裡提到：

遲暮少寢食，清曠喜荊扉。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違。試問甘藜藿，未肯羨輕肥。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勿矜朱門是，陋此白屋非。〈甘林〉<sup>75</sup>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老病忌拘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sup>76</sup>

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衰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杖，不厭北山薇。〈秋野五首〉其二<sup>77</sup>

鄙夫到巫峽，三歲如轉燭。全命甘留滯，忘情任榮辱。朝班及暮齒，日給還脫粟。編蓬石城東，采藥山北谷。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綠。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釣曲。曲直吾不知，負暄候樵牧。〈寫懷二首〉其一<sup>78</sup>

前文已言及，杜甫在夔府閒居期間仍然不減其憂國憂民、思君念闕之情懷。不過，此間的隱逸意識比起他在蜀中時有進一步的發展。杜甫在夔州，除了延續安於田野山林的閒靜自得外，對於出處、榮辱之理也更看得開，認為出處、榮辱各有定數，當順其自然。這樣的想法，與早期杜甫全心全意追求仕進失利後內心不平的情緒是不一樣的。早期的杜甫對出處、榮辱是相當執著的，對困窮的處境也是無法甘之如飴的，從他當時干謁的詩文中對自己困窮的描述可見一斑；晚年在夔州，杜甫非在官任職，對時危世亂已無能為力，加上身體衰老多病，詩人對自身老病遲暮有深刻的體認，頗能順應其疏放自適的「幽獨」之性，時而流露遁世慕隱、達觀任運之心思。<sup>79</sup>而安命而不憂貧的心境在他的詩作中有鮮明的呈現，這種看似消極的認知，反倒使杜甫的隱

<sup>75</sup> 見《杜詩詳注》，卷19，頁1667。

<sup>76</sup> 見《杜詩詳注》，卷19，頁1669。

<sup>77</sup> 見《杜詩詳注》，卷20，頁1733。

<sup>78</sup> 見《杜詩詳注》，卷20，頁1819-1820。

<sup>79</sup> 參見方瑜：《杜甫夔州詩析論》（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5年），頁106-108。

逸意識在境界上獲得提升，使他有較多的心思用在生命意義的反省上。

這並不表示詩人對致君行道、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或是「奉儒守官」的家族使命已然絕望，否則他不會到了夔府暮年還企望朝廷的擢用。仔細推敲，應是杜甫在多年的幽居生活中有了新的領悟，有了世俗理想以外的追尋目標。他除了繼續追尋政治理想與家族使命之實現外，也田野山林間找到了寄託，正追尋著一種出世的、身心清靜、順應自然的人生境界，正如同杜甫自己不止一次說他早有歸隱遁世之志，這樣的作為是與他隱逸的初衷相契合的，對他從前入世而仕進失意的際遇，也有著不小的寬解作用。夔州時期的杜甫，對佛門清靜之地似乎更加嚮往，有〈大覺寺高僧蘭若〉詩云：「香爐峰色隱晴湖，種杏仙家近白榆。飛錫去年啼邑子，獻花何日許門徒？」<sup>80</sup>又〈謁真諦寺禪師〉詩寫道：「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sup>81</sup>皆流露詩人對成為佛門弟子的企盼。即便杜甫最終並沒有皈依佛門，也沒有真正摒棄入世的理想、在身心都完全超然的情況下來隱逸幽獨，但佛教思想對杜甫之出世情懷確實具有強化的作用。

### (九)荆湘漂泊

荆湘漂泊是杜甫人生的最後階段。必須指出的是，如同前文所提到，杜甫的仕隱矛盾在此一時期依然持續著。即使已然衰老，杜甫仍在〈泊岳陽城下〉一詩寫道：「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鯤鵬。」<sup>82</sup>又有〈江漢〉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愁風病欲蘇。古老存老馬，不必取長途。」<sup>83</sup>足見詩人為國效力的壯志並未因年老衰病或漂泊不定而消磨殆盡，反而有一種老驥伏櫪的意緒。

無奈而矛盾的是，荆湘時期的杜甫終究不得不正視衰病的身體以及未卜的前程，為自己疲憊的身心尋求歇息的契機，雖然這般隱退的念頭與他暮年的壯心不已是背道而馳的。杜甫〈曉發公安〉詩中已經說：「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sup>84</sup>〈野望〉亦寫道：「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sup>85</sup>又在潭州作〈樓上〉一詩云：「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戀闕勞肝肺，掄材愧杞樞。」

<sup>80</sup> 見《杜詩詳注》，卷 20，頁 1801。

<sup>81</sup> 見《杜詩詳注》，卷 20，頁 1802。

<sup>82</sup> 見《杜詩詳注》，卷 22，頁 1945。

<sup>83</sup> 見《杜詩詳注》，卷 23，頁 2029。

<sup>84</sup> 見《杜詩詳注》，卷 22，頁 1938。

<sup>85</sup> 見《杜詩詳注》，卷 22，頁 1973。



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潭。」<sup>86</sup>由此不難體會杜甫當時心餘力絀的無奈和茫然。

唐代宗大曆四、五年間(769-770)，杜甫在衡州，曾考慮赴襄陽隱居，其詩云：

几杖將衰齒，茅茨寄短椽。灌園曾取適，遊寺可終焉。遂性同漁父，成名異魯連。〈迴棹〉<sup>87</sup>

生理飄蕩拙，有心遲暮違。……。鹿門自此往，永息漢陰機。〈登舟將適漢陽〉<sup>88</sup>

若端從隱逸意識來看，荊湘時期的杜甫除了延續夔州以來的安命自處，更加甘於遯世之外，亦強調自己嚮往的隱逸正如滄浪漁父之率性，不是為了要求取高名，他自認與好持高節而不受封賞、卻屢屢耽留於諸侯利害間的魯仲連是有所不同的，這樣的體認，可以視為杜甫晚年隱逸意識的境界向上提升的例證之一。

#### 四、杜甫隱逸意識的形態與其他盛唐詩人之異同

隨著科舉取士制度之崇重，唐代士人擺脫了魏晉南北朝以來選官制度講究世族門閥或地域的限制，有大優於前代的仕宦新契機，他們對仕宦的態度自然更形積極。但是在競爭激烈之下，並非人人皆能如願經由科舉考試而入仕；就算順利入仕，宦海沉浮的境遇卻冷暖自知。如此一來，難免會萌生隱逸意識，抒懷於詩文。

那麼，杜甫之隱逸意識與其他盛唐詩人之隱逸意識在形態上存在著什麼樣的異同呢？今分別以李頎、李白、賀知章、王維、孟浩然等人，與杜甫比較如下。

##### (一)以退為進的李頎

李頎曾經多年隱居於潁陽的東園，其詩寫道：

顧余守耕稼，十載隱田園。蘿篠慰舂汲，巖潭恣討論。〈無盡上人東林禪居〉<sup>89</sup>

男兒立身須自強，十年閉戶潁水陽。業就功成建明主，擊鐘鼎食坐華堂。……早知今日讀書是，悔作從前任俠非。〈緩歌行〉<sup>90</sup>

李頎閉戶隱居的意圖，是為了讀書自強，以待來日建功立業、求取富貴，他

<sup>86</sup> 見《杜詩詳注》，卷22，頁1998。

<sup>87</sup> 見《杜詩詳注》，卷23，頁2086。

<sup>88</sup> 見《杜詩詳注》，卷23，頁2088。

<sup>89</sup> 見〔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132，冊4，頁1346。

<sup>90</sup> 見《全唐詩》，卷132，冊4，頁1348。

將隱逸視為一種仕進追求的過程中以退為進(退而隱居讀書、進而仕進取祿)的手段，即懷抱「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的打算。杜甫早年干謁詩文也時常提及自己懷才不遇而將要隱逸，不過這主要是當時消極不平的情緒使然，並非要以退為進。

## (二)自許功成身退的李白

李白曾與杜甫一同訪道求仙，不但隱居過，還正式成為道教徒。其〈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提及自己的人生理想：

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不足為難矣。<sup>91</sup>

李白以管仲、晏嬰自比，足見他對自己的才能頗有自信，懷著遠大的抱負，對輔弼明主、建功立業極為重視，更以此做為退隱的前提。

李白在詩作中一再表明：

何時黃金盤，一斛薦檳榔？功成拂衣去，搖曳滄洲旁。〈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其二<sup>92</sup>

好古笑流俗，素聞賢達風。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還山留別金門知己〉<sup>93</sup>

留侯將綺里，出處未云殊。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贈韋祕書子春〉<sup>94</sup>  
陶朱雖相越，本有五湖心。余亦南陽子，時為梁甫吟。蒼山容偃蹇，白日惜頽侵。願一佐明主，功成還舊林。〈留別王司馬嵩〉<sup>95</sup>

李白以功成身退自我期許，體現一種功成始身退的隱逸意識之形態，固然重視「功成」，卻也顧及到「身退」，雖然一為入世、一是出世，但是對李白來說，兩者皆是他的人生理想，李白希望能夠求得兩全。

李白的詩又寫道：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sup>96</sup>

家本紫雲山，道風未淪落。沉懷丹丘志，沖賞歸寂寞。……且欣登眺美，

<sup>91</sup> 見《李白集校注》，卷 26，頁 1526。

<sup>92</sup> 見《李白集校注》，卷 9，頁 612。

<sup>93</sup> 見《李白集校注》，卷 15，頁 910。

<sup>94</sup> 見《李白集校注》，卷 9，頁 615。

<sup>95</sup> 見《李白集校注》，卷 15，頁 909。

<sup>96</sup> 見《李白集校注》，卷 14，頁 863。

頗愜隱淪諾。……提攜訪神仙，從此鍊丹藥。〈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sup>97</sup>

李白熱衷於遊歷名山、訪道求仙，因為那是他的志趣所在。在詩人的生涯規畫裡，歸隱名山與輔弼明主並不衝突，只是實現上有先後順序的差別而已。在功業未成之前，李白是不輕言歸隱的。由於他未能實現輔弼明主、建功立業的理想，使他曾暫隱山林以待成功之機，而隱不絕俗也就成為李白隱逸意識的另一個基調。

此外，李白〈為宋中丞自薦表〉一文提到：

伏惟陛下大明廣運，至道無偏，收其希世之英，以為清朝之寶。昔四皓遭高皇而不起，翼惠帝而方來，君臣離合，亦各有數。豈各有數。豈使人名揚宇宙而枯槁當年？傳曰：「舉逸人而天下歸心」……特請拜一京官，獻可替否，以光朝列，則四海豪俊，引領知歸。<sup>98</sup>

唐代帝王特別崇重道教與隱逸，「舉逸人而天下歸心」更是朝廷徵聘隱士時時常引用的口號，李白文中以漢初商山四皓自比，將唐玄宗比作漢高祖、唐肅宗比作漢惠帝，希望自己能獲得擢用而為肅宗效力。可見他也有意藉由隱逸修道來達到仕進之目的，從而實現其政治抱負。

杜甫和李白同樣懷抱輔弼明主的政治理想，不過李白的人生理想著重在自己如管、晏般的濟世之才能得以施展，杜甫則除此以外，還擔負著「奉儒守官」的家族使命以及忠君憂民的信念，所以他固然說自己「非無江海志」、「雅欲逃自然」，但是終其一生還以政治理想為自我實現的重心所在，他憂國憂民，是無法像李白將歸隱江湖當成是自己生涯規畫另一個部份，是無法瀟灑地說只要功成、即可身退，而置國事生民於不顧的。杜甫訪道求仙的努力並未能如李白那般熱衷而且持之以恆，雖然可以在他的詩作中看到學道的痕跡，但是仙、道對杜甫而言，養生遣興的成份居多，反觀李白則較為投入且成為道士，甚至把修道當做追求仕進的手段。

### (三)致仕歸隱的賀知章

說到功成身退，有「四明狂客」之稱的賀知章便當之無愧。他是進士出身，曾經擔任過太常博士、太子賓客、祕書監以及禮部侍郎兼集賢殿學士等官職。晚年致仕回歸故鄉吳中時，唐玄宗特別賜曲，皇太子和官員們還為他餞行，顯見他所受到的崇重與禮遇。賀知章晚年的詩反映閒適的鄉居情懷：

<sup>97</sup> 見《李白集校注》，卷25，頁1445。

<sup>98</sup> 見《李白集校注》，卷26，頁1519。

少小離鄉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銷磨。唯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  
〈回鄉偶書二首〉<sup>99</sup>

銀鏤銀盤盛蛤蜊，鏡湖蓴菜亂如絲。鄉曲近來佳此味，遮渠不道是吳兒。  
〈答朝士〉<sup>100</sup>

《新唐書》將賀知章列入〈隱逸傳〉，肯定他是一位隱士。他請為道士、捨宅為觀，致仕後歸隱田園的生活裡透露怡然自得的心境。雖然同樣是老年閒居，同樣有田園之趣，杜甫在夔州時也說他能夠自得，不過杜甫那種有志難伸後自我寬解的安命自得，比較起賀知章歸隱鄉里那種功成身退、無事一身輕的自得，兩者是大不相同的。即使杜甫能自我寬解，能安於隱居且樂在其中，但是在起心動念間，他還是會經常思君戀闕，還是掩飾不了報國無門的缺憾。由心境上自得的程度觀之，杜甫無疑是比不上在政治上已經有所作為而告老還鄉的賀知章。

#### (四)「朝隱」、「吏隱」的王維

早在李林甫、楊國忠先後主政時期，王維不肯阿附其間，就曾萌生隱逸之意。安史之亂後，他獲罪得免，逐漸無心於政治，晚年更全心奉佛，從塵事俗務中淡出，如其〈送孟六歸襄陽〉詩中云：「杜門不欲出，久與世情疏。」<sup>101</sup>又〈酬張少府〉詩中云：「晚年唯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sup>102</sup>又《舊唐書·文苑傳下》王維本傳亦載：

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間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別漲竹洲花塢，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談為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鑪藥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sup>103</sup>

王維不但虔誠禮佛，也時常在他的輞川別業遊賞美景，過著閒居田園的生活。縱然如此，王維實際上並沒有離開官場，而是一面做官，一面閒居與學佛的，他在〈與魏居士書〉一文中說：

<sup>99</sup> 見《全唐詩》，卷 112，冊 4，頁 1147。

<sup>100</sup> 見《全唐詩》，卷 112，冊 4，頁 1147。

<sup>101</sup> 見〔唐〕王維撰，〔清〕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卷 12，頁 269。

<sup>102</sup> 見《王右丞集箋注》，卷 7，頁 120。

<sup>103</sup> 見《舊唐書》，卷 190 下，頁 5052。

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慙也。……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人為適意。縱其道不行，亦無意為不適意也。苟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則何往而不適？<sup>104</sup>

王維隱逸意識的形態較接近魏晉南北時期的「朝隱」、「吏隱」，這種重視心隱而非跡隱、半官半隱的形態，是唐人隱逸意識的主流形態之一。在朝為官可以領有俸祿，維持一定生活品質與身份地位；閒居田園則能夠得到自我精神境界的提升與輿論的正面道德評價。在王維看來，只要「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做適意的事，官、隱兩者之間是可以取得平衡，無入而不自得的，所以他並不贊同陶潛棄官之舉。

相形之下，杜甫對於「朝隱」、「吏隱」則不敢恭維，如果已經決定要歸隱，他比較嚮往巢父、許由之類的超然隱逸，而不是亦官亦隱的形態，這也是他辭去幕府參謀的重要原因。再者，杜甫不像王維晚年可以達到「萬事不關心」、以禪誦為事的境界，晚年的杜甫仍舊憂國憂民。王維的「朝隱」，雖然「身」是入世的，但「心」大半是出世的。杜甫的幽居生活正好相反，「身」是出世的，「心」有多半是入世的，所以杜甫始終無法真正超然的成為隱士，這也是他說自己有慚於真隱、有愧於巢由的原因。而杜甫的隱逸意識裡雖然也有佛學的成份，雖然也可以看到他學佛的進展，但是在佛教義理的理解及學佛的境界上，杜甫是比不上王維的，這是王維全心全意的鑽研佛學而杜甫分心於關懷國事民瘼的自然結果。

##### (五)懷才不遇而思遁世的孟浩然

和杜甫隱逸意識之形態較為接近的是孟浩然。孟浩然一生的仕進追求並不順遂，其詩屢屢流露出懷才不遇而思遁世的無奈：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堂虛。〈歲晚歸南山〉<sup>105</sup>

吾道味所適，驅車還向東。主人開舊館，留客醉新豐。樹繞溫泉綠，塵遮晚日紅。拂衣從此去，高步躡華嵩。〈東京留別諸公〉<sup>106</sup>

<sup>104</sup>見《王右丞集箋注》，卷18，頁334。

<sup>105</sup>見〔唐〕孟浩然撰，佟培基箋注：《孟浩然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卷160，頁1652。

<sup>106</sup>見《孟浩然詩集箋注》，卷中，頁245。

遑遑三十載，書劍兩無成。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京。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且樂杯中酒，誰論世上名。〈自洛之越〉<sup>107</sup>

杜甫要延續「奉儒守官」的家族傳統，孟浩然也有「唯先自鄒魯，家世重儒風，詩禮襲遺訓，趨庭霑末躬」<sup>108</sup>的使命感。懷才不遇與仕進失意，都曾引發他們的隱逸之思，都由一種先前消極不平的情緒，逐漸發展成為後來對隱居生活的隨遇而安。杜甫曾經為了實現政治理想而干謁公卿，孟浩然在〈田園作〉詩中也直言不諱說：「鄉曲無知己，朝端乏親故。誰能為揚雄，一薦〈甘泉賦〉。」<sup>109</sup>亦頗有寄望有力人士汲引之企望。杜甫在隱居生活中仍然思君戀闕，不減報國之志，孟浩然也曾在〈與白明府游江〉詩中說：「誰識躬耕者，年年梁父吟。」<sup>110</sup>兩人同樣無法在完全超脫政治理想的單純心境下隱逸。顯示杜甫與孟浩然在隱逸意識之形態上有諸多相似處，難怪杜甫〈遣興五首〉詩其五云：「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清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sup>111</sup>頗有二人同病、憐孟自憐的意緒。

## 五、結語

杜甫終究未能實現他致君行道、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卻也無法任真自得地在完全超脫政治理想的出世心境下隱逸，這是他深受儒家思想薰陶後積極用世的意志使然，<sup>112</sup>也是他之所以能夠成為「詩聖」的重要原因。

杜甫雖然渴望出仕，但他狂簡不拘、不喜應接人事、嚮慕自然的性格其實不適合當官，而他為了實現重要的人生目標卻不得不勉強自己努力求仕，直到晚年才逐漸順應自己的本性，此亦為杜甫於進退出處間精神矛盾之所由生，終其一生，如影隨形，不亦勞且苦乎？隱逸之於杜甫，彷彿巨石之於希臘神話裡的西西弗斯(Sisyphus)，在積極用世(實現政治理想和延續家族傳統)的意志的擺布之下，成為永無止盡卻又徒勞無功的追尋，即便身隱而心未能隱。

換個角度來看，在假隱釣名、干祿之風盛行的唐代，杜甫對於隱逸的認知其實是正確的，他一向仰慕的是真隱士，即便他有「薄劣慚真隱」的自覺，

<sup>107</sup>見《孟浩然詩集箋注》，卷中，頁 217。

<sup>108</sup>句出〈書懷貽京邑同好〉，見《孟浩然詩集箋注》，卷中，頁 170。

<sup>109</sup>見《孟浩然詩集箋注》，卷下，頁 355。

<sup>110</sup>見《孟浩然詩集箋注》，卷上，頁 102。

<sup>111</sup>見《杜詩詳注》，卷 7，頁 565。

<sup>112</sup>劉長東指出：「雖然杜甫終其一生都有隱逸思想，但是杜甫終究未隱，從其主導方面來說，他還是一個代表儒家思想和積極用世精神的典型。」見劉長東：〈論杜甫的隱逸思想〉，《杜甫研究學刊》1994 年第 3 期，頁 23。

卻沒有將隱逸當成追求仕進的手段來看待，亦未附和「朝隱」、「吏隱」之風。更進一步，杜甫能夠在幽居遁世的生活中心學習自我寬解並反省人生，使其隱逸意識之內涵，不停滯於情緒宣洩，逐漸深化成為具體而理性的生命思維，這是他值得肯定的地方。

## 參考文獻

### 一、古籍

- 〔梁〕蕭統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94年。
- 〔唐〕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唐〕李白撰，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唐〕王維撰，〔清〕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唐〕孟浩然撰，佟培基箋注：《孟浩然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
- 〔唐〕李商隱撰，〔清〕馮浩箋注：《玉谿生詩集箋注》，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
-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宋〕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
-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二、近人著作

- 方瑜：《杜甫夔州詩析論》，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5年。
- 莫礪鋒：《杜甫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 陳貽焮：《杜甫評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 黃奕珍：《杜甫自秦入蜀詩歌析評》，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
- 楊伯峻：《論語譯注》，臺北：華正書局，1990年。
- 歐麗娟：《唐代詩歌與性別研究--以杜甫為中心》，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
- 簡明勇：《杜甫詩研究》，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年。
- 蘇怡如：《獨立蒼茫自詠詩--杜甫入蜀以後詩歌析探》，臺北：世新大學，2013年。

### 三、期刊論文

- 孫永忠：〈愛花欲死杜陵狂--談隱逸為杜甫開啟新生命情趣〉，《輔仁國文學報》第27期，2008年10月。
- 劉長東：〈論杜甫的隱逸思想〉，《杜甫研究學刊》1994年第3期。